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 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 ——以中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毒气战为例

周东华

在普通人或底层精英的视野中，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的生化战（主要是毒气战和细菌战），中国是无助的受害者，政府既没有向民众宣布日军如何推行生化战，也没有向国际社会控诉侵华日军罪行。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王世杰解释：“我方恐此种事实之发表足以动摇人心，故迄少露布。”“迄少露布”不等于没有“露布”。1941年前，中国政府也曾多次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毒气战罪行。待到1942年5月11日英国丘吉尔发表警告德国勿对苏联施用毒气战声明后，饱受侵华日军毒气战伤害的中国，积极主动向盟国谋求制止侵华日军勿施毒气战声明。学术界对此已有研究涉及。对中国向盟国争取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的来龙去脉、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事务话语权以及争取行动背后的弱国外交问题，尚未能利用国民政府高层人物的日记、往来电文等档案史料展开论述。本文拟根据蒋介石、王世杰、陈布雷、顾维钧、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层的日记、往来电文等，结合中英文报刊资料，对这些问题作一专题探讨。

### 一、对自己抗战的前途看到更 明确的远景：中共的揭发 与控诉

1938年3月29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份通电，揭露日本企图“以飞机数十架”，向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投掷“微菌弹”，“期整个消灭我各该地军队及参加作战之人民。”“向我政府

及全国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和民主组织，国际联盟和各国政府及一切民众团体呼吁，请求你们立即一方面发动全中国和全世界舆论，抗议和制止日本法西斯军阀拟定的施放毒气、毒菌杀害千百万生命的残酷兽行；另一方面，速即给敝军及晋省、陕北和晋冀鲁区域民众以防毒防疫的物资帮助。”在中共看来，日本法西斯对山西和陕北延安等地公然“施放毒气、毒菌”，是违反国际公法和人道主义的战争罪行，必须制止；另一方面也呼吁全国全世界援助八路军和山西等地民众“防毒防疫的物资”，以期保卫生命。

在呼吁基础上，朱德进一步提出，“日寇”能在陕北和晋冀鲁区域“以此种非人手段屠杀敝军及千百万民众”，则“任何时候均可在全国任何地方出现”同样罪行；“日寇”能在中国施行“此等违反国际公法和起码人道精神的举动”，则“日寇及其他法西斯又何尝不可以同样残杀手段加之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军民”，朱德建议，“立刻用一切有效方法抗议和制止日寇此种施放毒气、毒菌的罪行”。在朱德看来，这“不仅是敝军和晋省、陕北及晋冀鲁数千万男女老幼的迫切呼号和希望，而且是全中国同胞应该立即奋起进行的公共事情；不仅是有四万万五千万全中国同胞生死的问题，而且是有关全世界人类命运的问题。”

应该说，朱德代表中共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制止日军生化战的呼吁，有据有理，从陕北延安、山西等地方推及全国、由日本法西斯在

中国的罪行推及其他法西斯在全世界的罪行，这是抗战时期中共最早向全中国、向全世界呼吁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的声明，也是最早向全中国、向世界请求防毒防疫援助的声明。

此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类似声明，揭露并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企图。例如，9月22日刊登新闻称“华北各铁道公路沿线敌，不时遭我游击部队袭击，损失甚重。敌军行动不自由，恨我沿线民众助攻敌军，于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乱、伤寒等病菌，故华北月以来，疾病流行，势颇猖獗，我民众染疫而亡者在8月份一个月中已达四五万人。敌军无耻，现反到处宣传系我方所为。此种荒谬绝伦之狡辩，我前方官兵及民众，莫不痛恨入骨。闻驻华北世界红十字会主持人，已对敌提出严厉之斥责。”这则新闻不但揭发了日军的生化战罪行，而且揭露了日军反咬一口的荒谬言论。10月11日朱德和彭德怀再次通电，揭露日军在豫北的生化战，“豫北敌以迭遭我袭击，伤亡惨重，乃在道清路两侧地区，烂施霍乱及疟疾病菌，民众罹毒者甚重，内黄、博爱等县尤剧，每村均有百数十人，惨绝寰宇，无复人性。”中共在1938年的这些揭露日军生化战的通电，产生了积极效果，据1942年7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远在抗战初期徐州会战之前，敌人就宣传过要对晋冀的游击队及延安投放毒弹，它的阴谋，当被朱彭总副司令揭露并通告全世界，一时未得售。”

在浙赣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揭露侵华日军生化战罪

行声明。1942年6月26日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通电“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揭露日军对河北省定县北坦村民众“施放毒气”，造成800余人被毒死的暴行，“为了维护世界公理、公法和正义，我们要求全世界所有的正义人士，用各种方法，对毁弃这些公理、公法、正义的日本法西斯盗匪，以有力的制裁！”7月21日《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敌人愈接近死亡，其行为也就愈疯狂残暴。在侵华五年战争中，它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来杀害我抗战军民，直欲灭绝中华民族的种族。而最毒辣的暴行，是施用国际公法所绝对不容许的毒气。自八一三淞沪之役以迄目前的浙赣战场、华北战场，日寇在较大战役中，都用过毒气、毒弹，甚至毒菌。”对此，中国共产党“谨代表华北一万万军民，和其他战区人民，向全世界控诉”。在此控诉中，中共直接引用6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招待记者席上，特为日寇在中国战场施用毒气，所发表的‘以毒攻毒’的谴责的声明，要求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日寇予以有力的制裁！”和6月6日路透社华盛顿电“过去五年内，日军在中国战场施用毒气，不下千余次”电文，向“盟国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士”呼吁关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对于中国军民，尤其是身处敌后，既乏武器，又毫无防疫防毒设备的华北军民，予以物质上的援助！”

中国共产党通过通电、社论、报道等多种形式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揭露侵华日军生化罪行，其目的，一方面是揭露日军战争罪行，“政治部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大纲上，特别把‘揭露敌人的残暴，警戒预防敌人施用毒气、毒菌、毒药等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暴行’列为今后加强努力的必要的任务之一”，另一方面，争取国际进步舆论支持，“在国际舆论上的一些反映”，“在促进国际形势的好转上是有着决定的作用；它能使‘不十分相信’的‘军事当局’‘颇为满意’，它能使一向对侵略者妥协求全的‘负责人士’觉到‘侵略集团的地位是在削弱，民主集

团的地位为之增强’。我们再不容怀疑到世界和平阵线‘并无实力’或竟‘并不存在’了。”再一方面，向世界和平力量募集抵御日军生化战资金或设备，“在国内外立即募集防毒基金、防毒器具（防毒面具、防毒雨衣等）和制造防毒器的材料等，首先供给前方将士的急需”。最后一方面，使自己冷静，清醒认识日军的侵略阴谋与应对路径，“因为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抗战在国际形势上的作用，有更清晰的认识，对自己抗战的前途看到更明确的远景”。这与国民党的揭露和争取国际声援，有着根本区别。

## 二、这一惨无人道的行动本身必须受到谴责：王世杰的揭发尝试

相较于中共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通电，国民党方面亦有所行动。1938年5月16日政治部部长陈诚招待驻武汉外国记者，就日军已经施用及准备大规模施用毒气战问题，向世界控诉。陈诚说：“单从4月5日起，敌人在中国各地使用了毒气七八次。例如4月5日敌人在台儿庄连续使用催泪瓦斯弹毒质手榴弹；4月19日宜兴、溧阳，敌人放射燃烧弹瓦斯弹，使我兵士多人中毒；5月6日，沿长江各镇，发现大批含有毒质的咸盐，查系敌人在芜湖盐仓投毒，再用兵舰运往沿江各镇，由汉奸兜售；5月3日，芜湖敌人在老山施放绿色毒气，我军中毒者多人，同日敌人又在台儿庄东北大官庄一带施放催泪瓦斯；5月4日，孙家埠敌人于巷战中施放催泪瓦斯，并使用达姆弹；5月5日，台儿庄东北泥沟，敌人被我军追击时，又使用催泪弹。”陈诚特别强调，“日寇”将这种“违反国际公法与人道主义的禽兽行为”“当做家常便饭”。

在揭露日军对华使用毒气战证据后，陈诚表明“关于敌人大规模使用毒气”一事，国民政府在5月13日“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控诉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大规模的化学战争”。陈诚说：“我们希望：（一）国联行政院接受中国政府的

申请，明白痛斥日本进行化学战争的违法，并给予警告。假使日本再使用毒气，当即实施对日集体的制裁。（二）各国拥护国际公法及人道主义的政府，个别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不得再使用毒瓦斯，否则一致拥护国联对日的制裁办法。（三）各国报章杂志，一致著论申斥日本使用毒瓦斯，造成全世界舆论对日本野蛮行为的大制裁。（四）各国广大民众，如慈善宗教团体、劳动团体等，以种种行动，如示威、集会、广播、讲演、传单等，痛斥日本的兽行，以全世界民众压倒的姿势，来阻止日寇在鲁南准备施行惨无人道之化学战争。（五）各国民众加紧抵制日货，加紧阻止军用及一切原料运往日本，加紧拒绝起卸日货，以唤起日本国内民众广泛的不满，以加速日本民众对日侵华战争的一般的反对。”陈诚的5条呼吁，过于理想化，且不论国联并无制裁日军的实力，即便是有实力发言的英美等国，也没有回应。

1941年9月28日—10月12日间，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牵制日军，第六战区对宜昌发动反攻。10月9日第9师突击营反攻夺回东山寺等点，成功突入宜昌城内。日军第13师团为挽回颓势，违反国际公法，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弹。

10月13日，国府要员王世杰表示：“我攻宜昌军自敌军使用毒气后，已放弃即时夺取城区之企图，现正布置抵御救援军。予于今日午后晤见外国记者时，将敌军使用毒气之事实，郑重宣示。”按照王世杰说法，这是他第一次向“外国记者”揭发宜昌战役中日军施用毒气战事，并明确从淞沪会战开始，日军“仅用流泪性、喷嚏性之弹”，而到武汉会战时，“已逐渐使用窒息性及糜烂性之毒气炮弹或飞机弹”。

1941年11月湖南常德发生鼠疫，经过国民政府卫生署金宝善、容启荣和国联防疫专家伯力士等调查。到1942年3月23日，接获金宝善等报告的王世杰确信系日军“用飞机散播鼠疫菌，引起当地发生鼠疫”。3月31日，王世杰正式向中外媒

体揭露侵华日军在常德的鼠疫战。他说：“予于今日午后接见外籍记者席上，将日军在常德等地散播鼠疫菌之医士报告发表；并力主同盟国于战事总结时必须惩罚执行此种违反人道战术之日本军官。”

王世杰日记中并未收录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这份声明，但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馆藏一份题为《日军细菌弹引发鼠疫的医学证据报告》中收录了王世杰的这份声明。王世杰说：“现在回想一下，早在1940年10—11月间日军飞机袭击浙江鄞县、衢县和金华，散下大量被感染的麦粒，疑似日军采取的细菌战。但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缺乏足够的实验设备，我们的卫生署专家对日军这一犯罪并未下肯定结论。然而，通过最近对1941年11月4日常德鼠疫的调查，毫无疑问是日军的罪行。”陈文贵医生、金宝善和伯力士在检验后都证实这是日军飞机投下的带有鼠疫跳蚤的谷物，“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非常严格而有效的措施去预防日军这种非人道犯罪。同时强烈提请盟国注意日军的战争犯罪。我毫不怀疑日本将否认，就如同它曾否认过去的强奸暴行、虐待百姓、使用毒气和其他暴行一样。但我们坚信真相不容抹去”。

紧接着王世杰声明的是金宝善的《日军试图在华施行细菌战》，依次列举了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在浙江宁波、10月4日在浙江衢县、11月28日在浙江金华、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等地施行的鼠疫战，称：“根据迄今搜集到的事实一览表，不能不得出日军在中国试行细菌战的结论。”

王世杰的声明和金宝善的报告，开始让国际社会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美国和英国虽然没有立即做出声援中国，发表谴责和制止日军施用生化战的声明，但至少这两国的情报部门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侵华日军生化战的情报，尤其是美国，这些情报被送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手中。1942年5月15日“为盟军承担一次巨大报复”的浙赣战役爆发，日军在战事失利时再次公然

违背国际公法，悍然施用毒气战。受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的制止德军对苏联实施毒气战声明刺激，蒋介石希望美国也能够仿效英国，对日本发表类似声明，这便是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声明的出台。

### 三、以期同盟国或美国能作一种表示：争取罗斯福发表对日声明

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机队空袭日本东京，随后迫降浙江、江西境内。日军大本营随即更改原定作战计划，发动以“击溃浙江方面的中国军队，摧毁可被利用来打击日本本土的航空基地”为目的的浙赣作战。5月23日，日军出余杭，沿富春江以西地区侵扰，相继攻陷新登、桐庐两县，直逼建德洋溪，企图强渡新安江，以合围金华、兰溪。为尽快推进，日军使用毒气攻击。这是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施用生化战的开始。

蒋介石认为浙赣战役是中国为盟友美国袭击东京而承受的一次巨大损失，侵华日军在浙赣战役中施用生化战，美国有道义上的责任援助中国，制止日军再次施用生化战。5月29日，蒋介石给宋子文电报：“敌军此次进攻浙东之建德与金华两地，皆施用毒瓦斯炮弹，在建德上空且施用飞机投掷毒弹，以致我军中毒伤亡者甚多。又自去年10月间，在宜昌施用糜烂性毒瓦斯，中外医生皆在我伤兵身上获得确切之证明，此次又在浙东施用毒气，若不由国际严斥与声援，恐其以后更放肆无忌。”蒋介石希望宋子文与美国政府“切商声援与斥责之道”，他特别指出：“例如上次英国首相对德之斥责，若德对俄施用毒气，则英亦必还报之之意，且辞义必十分严正为盼。”宋子文回电：“奉艳电经转陈罗斯福总统后，今罗总统宣布日寇再在中国施用毒瓦斯，则美国必采同样步骤，以报复之等语。”

6月3日，王世杰称他发电报给驻美大使胡适，“列举日军在华使用毒气情形”。6月4日，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收到王世杰发出的名为《日

本在中国进行毒气战的报告》文件。同日，美国助理副国务卿伦古向罗斯福提出“关于使用毒气问题，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尚未发表任何正式的评论”，他认为日本很难接受如此“文明化”方式制止细菌战的警告，主张中国政府提供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详细战报和医学调查证据。

6月6日伦古希望中国政府递交的证据材料抵达美国国务院，而罗斯福却在前一天，即6月5日就发表了对日声明。罗斯福说：“本国政府接获真确报告，日军曾在中国各地使用毒气，或有损健康之瓦斯。余今特明确宣示，倘日本坚欲以此非人道之作战方式对付中国，或其他任何盟国，本国政府认为此项行动，无异对美而发，将采取同样办法，尽力报复，吾人将准备实施完全之报复，其责任应由日本负之。”

罗斯福之所以在正式接到中国方面递交的侵华日军生化战报告前一天即发表对日声明，吉见义明认为早在1941年11月宜昌战役后美国陆军部就已经开展对侵华日军生化战情报的收集，并将之呈送罗斯福审阅。实际上，1942年4—5月间，美国政府从多个渠道得到了侵华日军施行生化战情报。例如，4月7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收到外交部6日电报，称“国民政府卫生署长金宝善声明：由中外医疗专家递交的报告显示侵华日军至少5次对中国实施细菌战试验”，并概述了侵华日军在宁波、衢州、金华、常德和绥远实施细菌战情形。4月16日，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将《费城纪事》上刊登的一份题为《日本发动细菌战，这也许是他们避免被美国打败的最后一张王牌》的剪报转呈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主官，该剪报援引侵华日军在常德施行的鼠疫战史实。5月1日，驻重庆美国大使馆武官助理包瑞德向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局主官递交了两份《新华日报》刊登的侵华日军企图在冀晋察地区和太行山区制造鼠疫的报道。5月5日，驻重庆美国大使馆官员高斯向美国国务卿递交国统区鼠疫流行

情报简报，称湖南常德鼠疫系由侵华日军细菌战引发。

因此，当1942年5月15日浙赣战役爆发，蒋介石于5月29日请宋子文转告罗斯福，希望罗斯福能够发表警告日军勿施生化战声明时，罗斯福对侵华日军生化战均有相当了解，故他痛快地答应了宋子文转述的蒋介石请求，于6月5日正式发表对日声明。

1942年6月5日罗斯福按蒋介石愿望发表对日声明，警告侵华日军勿再施用生化战后，蒋介石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已经重拾尊严。按照蒋介石期许“同盟国或美国能作一种表示”设想，美国总统罗斯福声明发表后，同为盟国的英国，也应该公开发表同样声明。但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先于罗斯福发表对日宣言前，即5月10日已经发表制止德军对苏联毒气战声明，而在丘吉尔这一对德声明中，只字未提中国。对此，蒋介石恼怒嗔怒，一度考虑退出伦敦太平洋会议，召回驻英大使顾维钧，以维护大国脸面。待到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后，蒋介石着力改善中英关系，敦促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向大会提案，请求公开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声明。

#### 四、对美英之政策所以不能不克己自反：蒋介石的反省

1942年3月，英苏关系出现了一段较为亲善的时期，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称，“由于普遍希望在德国即将发动的攻势中设法给苏军以援助，而且，由于担心德国会使用毒气，可能是芥子气，我已征得内阁的同意，准备发表公开声明：如果德国人对俄国使用毒气，我们也将用毒气攻击德国，作为报复。”3月20日，丘吉尔致电斯大林，“经与我的同僚和三军参谋长商讨之后，我愿向你保证：英王陛下政府将把对俄国使用毒气武器一事，看做如同对我们自身使用的一样。”3月30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我愿向你表示，苏联政府对于英国政府保证把德国人对苏联使用毒气一事看作如

同对英国使用这种武器一样，（而且）英国空军将立即对德国适当的目标使用英国所储存的大量毒气弹，十分感激。”斯大林接受了丘吉尔递出的善意。

5月10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警告德国勿对苏联采取毒气战声明。王世杰在日记中记录：“丘吉尔首先发表广播演说，警告德国，谓德如对苏使用毒气，英必对德使用毒气。”丘吉尔的这份对德声明，极大地刺激了国民政府高层。王世杰说：“演词中对苏对美，备极称扬，但无一字言及中国。显然系对中国方面近来批评英国之言辞表示不满。中英邦交显已伏有暗礁。予甚忧闷。”陈布雷也认为“战氛日恶，而莫相昨日演词竟未提中国只字，远东抗战之局殊可忧也”。

相比王世杰和陈布雷，蒋介石对丘吉尔对德声明只字不提中国事更为恼火。蒋介石认为“丘吉尔十日演说，对战局独重俄国，兼带美国，而对于我国只字未提，缅甸之败，我军被欺受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境被围，未脱险境，彼不仅不加救援，而亦未提我援缅之贡献，于情于理皆无，此种恶劣之态度，可憎已极。古人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吾今更觉英尤之不可共事也。”王世杰说他上午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有关丘吉尔对德声明的看法，下午前往蒋介石住宅汇报他对中英关系的看法，感觉到蒋介石“对丘吉尔态度甚慷慨，且拟命令顾少川停止出席伦敦太平洋会议”，王世杰“力陈不可”。陈布雷于13日起床后不久便被蒋介石约去谈话。陈布雷发现蒋介石“对英国慷慨极深”，“口授要旨”，命令陈布雷“拟致宋转告罗总统电”并“拟令我方在伦敦太平洋作战会议停止出席，或将召回驻英大使，可于电中言之”。陈布雷“回寓后仔细考量”，觉得“甚难着笔”。

对于王世杰和陈布雷的劝谏，13日下午气消一半的蒋介石有所考虑，其日记称：“及至午后看伊川学案，至‘艮其背，不获其身’一节，更觉我与忘我意义之重要，则此心甚觉宽大舒畅，较之战胜敌国为快，乃

知克己自反之学，必须从宽缓与忍耐始也。布雷为余草罗斯福函后，亦详函劝解，获益非浅也。”

丘吉尔的对德宣言是导火索，将蒋介石积累的缅甸战事失利、英国以欧洲战场为先、忽略中国大国地位等因素聚焦引发，驻英大使顾维钧称“英国人坚决主张将盟国军事力量集中投在欧洲战场上，这种主张最后赢得了美国的同意。这就在中英关系上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英国政府的欧洲优先导致了中国政府“极大的失望和不满”，顾维钧认为“这种情绪特别是针对着英国对亚洲战争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为改善不断恶化的中英关系，5月30日顾维钧和艾登进行了非正式会晤，艾登说将安排顾维钧与丘吉尔见面。

6月3日，顾维钧与丘吉尔会晤，“感到首相对最近一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全都知道，他显得有些严峻，不像平时那样亲切。”在顾维钧看来，会面当日丘吉尔显得不高兴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英两国政府间关系的不断恶化”。为此，顾维钧尝试说服丘吉尔改善中英关系。

6月4日，蒋介石“考虑时局曰：‘（一）英国要求协商收复缅甸之计划，近来似已觉悟以前对华态度之不当矣。’”表明蒋介石十分关注中英关系的改善问题。6月6日顾维钧在电报中详细交代了与丘吉尔会谈事，“英首相丘吉尔约往长谈，钩表示我方对缅战至失望。现日本集结兵力四面攻华，益使民众感觉缅战结果影响中国，战事甚巨，极望英军设法改善局面”，随后，顾维钧总结会谈4点成效：第一，英国认为中国战区十分重要，“并未轻视”，“英方决定一俟数月后准备完成，即反攻日本”；第二，对于有效援助中国的办法，“正在进行”，“英于败德后，决定继续攻日至日战败为止”；第三，英国将在财政上“继续助华”；第四，英国希望中国对于英国的印度政策以及在远东的作战用意，“万勿误会”。顾维钧在电报中提及丘吉尔希望与蒋介石协商缅甸战事，

蒋介石表示同意，但协商的时间需再行商定，对蒋介石而言，横亘于中英关系的关键问题是缅甸战事，但凡英国在缅甸战事上有所反思、有所行动、有所让步，他均愿意顺势而为，推动中英关系改善。

由于英国在缅甸战事问题上犹豫不前，中英两方虽然有改善彼此关系的愿望和行动，但效果不佳。到6月中旬，顾维钧观察到“两国关系仍在不断恶化”，“到了夏天”，顾维钧甚至接到蒋介石密电，指示他“再不要向英国人提贷款的事，也不要向他们乞求任何援助”。在顾维钧看来，导致中英关系改善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缅甸战事迟疑不决、中英贷款迟迟未能敲定、英苏同盟条约和中国大国地位的确认问题。而这一时期英国与苏联签订的英苏同盟条约，再次刺激到蒋介石的精神，猜忌、多疑、敏感的蒋介石和欧洲优越、英美优秀、帝国优先的丘吉尔共同使中英关系再度紧张。

早在6月5日日记中，蒋介石对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访问美国事不满，认为罗斯福向苏联表明中国“四大国之一”地位，但苏联对此熟视无睹，联想到英苏同盟条约，蒋介石又表示焦虑。他说：“英、俄乃订立战时与战后廿五年同盟协定，其主旨旨在维持欧洲局势，更与我华无关矣。”为表示中国系主权独立的“四大国”之一，6月1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就英国外相伊藤就英苏同盟及大国地位演说表示不满：“英国外相伊藤在俄、英同盟协定成立时演说，以世界人类各民族生命之前途，皆决之于美、俄、英三国之合作，而视中国与其他各国为无物。”蒋介石称英国这种行径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之阴谋”，是英国“自私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之劣性”。他强调，“若非美国主持公道者，参加此次同盟联合在内，则中国实羞与为伍矣”，并在内心批评英国“若再任其称霸世界，则人类将无将来矣”。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蒋介石“对英国在印度问题上的政策已感不满，此时又发现英国人对贷款的态度如此令人失望，甚至

有时使人‘生气’”。

6月17日，顾维钧应约拜访艾登，“主要议题是如何改善两国关系和消除误解，这是我们双方都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王世杰在6月19日记中记载：“英方力图纠正此种情形，但蒋先生与丘吉尔之间久无文电往来，显然有隔阂存在。”王世杰认为英国对华五千万英镑借款迄未商定条款；苏联迄未允许提供足够汽油，始终未允许对中国提议借道波斯湾运送美国来华物资之提议；中国政府在兰州扣留秘密运物至延安的苏联之飞机，“凡此种种，均为有害之暗潮。”因此，王世杰希望国民政府有人可以居中斡旋，解决政府面临的外交困境。太平洋军事会议期间丘吉尔、罗斯福等表态，令蒋介石看到美英与苏联究竟不同，英国承诺出兵缅甸、承认中国战场的地位，承认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成为中英关系缓和的着力点。

6月21日蒋介石电宋子文，“探询美国是否参加英俄同盟之意，并标明我中国之态度”，甚至提出“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决策。他说：“中国对国际政策，无论军事、政治皆惟美国之马首是瞻，凡美国不参加之事，则中国亦不愿单独参加，如美国参加之事，则中国亦必须共同参加。”蒋介石进而提出，“吾人深信美国对我之政策亦必如是也。”在强硬的英国面前无力的蒋介石，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罗斯福身上。

从6月28日日记开始，蒋介石对英国的态度虽有改观，但仍将英国视为“企图统制中国者”“无信义国家”。蒋介石6月28日日记，“预定，电宋、顾，督促英国，照邱在美国太平洋会议中所言者，如期攻缩。”蒋介石特别记录，“注意，俄、倭、英三国皆无信义，而企图统制中国者也，然而英国之行动，未如其他二国之显著也。”在6月30日本月反省录中，蒋介石称“俄莫洛托夫分访英美，订立英俄25年同盟，此于中国未始无益，观英美对俄所表示者，每提中国为盟国四强之一而不肯遗忘，此或使俄不快与不安，或使俄对华态度与政策，有所变更乎。”中国系“盟

国四强之一”的提法让蒋介石深陷其中，他主张以“忍”字诀发展与英美外交关系：“我国对美英之政策所以不能不克己自反，切毋以小不忍而乱大谋。”

## 五、惟宣言一层，英方不无困难：丘吉尔的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倡议召开太平洋军事会议，邀请太平洋地区的盟国共同与会研讨战争局势。会议地点一般放在华盛顿白宫进行，有时也在英国伦敦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举行。1942年5月7日，罗斯福在给蒋介石电文中称“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太平洋作战会议，所有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均可参加。……美国参谋长使我确信，有关你的杰出的国家从事这场战争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不与你的尊贵的代表协商而进行，他将获得充分的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罗斯福进一步保证，“宋子文博士能成为太平洋作战会议的战员，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深深地感激他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和他经常不断奉献的建议和情报。”按罗斯福承诺，中国的诉求可以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得到充分的、平等的机会予以实现。对蒋介石而言，1942年6月5日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后，蒋介石希望在伦敦举行的太平洋军事会议上顾维钧能够敦促会议发表类似罗斯福对日声明的公开宣言，以弥补1942年5月10日丘吉尔对德声明中只字不提中国的尴尬，以匹配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

在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前两天，日本东京方面发表消息称“中国军方一位高官在新闻发布会上断言日军在金华和兰溪使用了毒气战”一事“系中国政府一贯的谎言”，断然否认对华施用了毒气战。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是日本的惯用伎俩，促使中国赶紧向世界呼吁认清并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罪行。

6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乞饬各机关发言人对于宣传敌使毒气万分慎重注意”，对侵华日军毒气战和细菌战的事实报道要精

准。他说：罗斯福对侵华日军施用毒气“已经切实严厉警告”，之后如果日军“再用毒气”，中国方面“最好证据确实”，“或使友邦军官目睹死伤惨状”，唯如此，“始足以激发友邦公愤，或实行报复手段”；如若不然，“则反足使警告失其效力”。6月17日，宋子文再次致电蒋介石，就华盛顿太平洋军事会议上罗斯福关于毒气战问题的两点表态作了汇报。第一，罗斯福称“德意对英美警告勿用毒气宣言，实为准备自己开始用毒气，故我联盟国对于敌施用毒气宣传最好谨慎”；第二，侵华日军“确对中国军队施用毒气”。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应邀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面，特别谈到“日本人使用毒气的报道”。在这次会谈中，顾维钧可能已经向艾登提议将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作有关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提案。

对于宋子文在太平洋军事会议上的提议和罗斯福、丘吉尔等表态，蒋介石都认为是“敷衍之词”，是“空言搪塞”，期望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有所收获。在英国，整个6月份顾维钧都没有机会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提出提案，直到7月14日他才正式在会上提出制止侵华日军生化战提案。

7月14日下午，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召开。丘吉尔首先在会上报告他与罗斯福商定的远东战局情形，第一，日军集中军力侵占中国，在英美“预料”之中，英“对我表述同情”。第二，丘吉尔认为如果“苏联战事不利，日必攻苏”，果如此，“则远东战事形势不同，可另开新局面”，“英美等将四面攻日，俾减少苏华之痛苦”。顾维钧最后提问，“我前提之日对华施用毒气与微菌战案，今日讨论”，他特别“要求参照最近美国总统对日及邱相对德之宣言，由会对日作同样表示，使敌有所警惕，对我不敢再施用，并致联盟之致”。

顾维钧所谓“前提之日对华施用毒气与微菌战案”，是指他7月3日递交会议讨论的提案和两份附件，顾维钧说：“根据蒋介石指示，我很荣幸呈上两份声明，一份涉及侵华日

军施用毒气战，另一份涉及过去2年内侵华日军施用细菌战试验。我提请参加太平洋军事会议的成员们关注这些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公然违反日本政府自身也同意的国际公约的非人道方式。”7月13日，顾维钧的提案和两份附件由会议秘书处复制11份，分发给英国首相丘吉尔、英国内政大臣、英国外交大臣、荷兰首相、顾维钧、印度和缅甸秘书长等11人。

在第一份附件《侵华日军毒气战》中首先列举了1942年浙赣战役中日军最近施用的3次毒气战，随后，该文件统计了截止1941年6月底侵华日军一共施用876次毒气战，这些毒气可分为6类，其中3类属于刺激性毒气，另3类属于有毒毒气，危害性也逐年提升。抗战爆发后日军对华第一次毒气攻击发生于1937年淞沪会战，当时仅施用了催泪瓦斯等刺激性毒气。在1938年台儿庄大捷后，日军运送更多的化学武器到中国，在武汉会战中多次施用毒气。1938年10月后采用窒息性毒气，1939年7月在晋南用飞机投掷毒气弹。在介绍完宜昌战役中日军毒气战及中国军民伤亡情况后，该文件列举了中国各战区捕获的日军毒气战“极密文件”，最后列举了最近6次侵华日军在浙江和河南的毒气战。

在第二份附件《侵华日军细菌战试验》中详细列明有中外医疗专家证实的过去两年中侵华日军的细菌战，分别是：1940年10月4日在浙江衢县（今浙江衢州主城区）日军飞机空投染有鼠疫病菌的小麦等引起当地鼠疫；1940年10月27日日军飞机在鄞县（今浙江宁波主城区）上空散下大量麦子和粟米，于10月29日引发第一例鼠疫；1940年11月28日在浙江金华投下大量跳蚤，经当地医院检验，系鼠疫跳蚤，随后引起当地鼠疫；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日军飞机低空投下纸张、棉絮等物，引起鼠疫；最严重的鼠疫发生于绥远地区，截至1942年1月最后一个星期共发生600余起鼠疫传染病。大量事实证明侵华日军在中国施行细菌战试验——在浙江和湖南日军飞机空投物成功引发

了鼠疫流行。文件最后对侵华日军非人道的细菌战进行了强烈谴责。

顾维钧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他希望会议能够按照丘吉尔对德声明和罗斯福对日声明，发表一个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的公开声明。但丘吉尔的兴趣点不在此。顾维钧在电报中称“邱相谓我所举事实确凿，理由充分”，但是他不愿意发表公开宣言，“惟宣言一册，英方不无困难”。丘吉尔作了两点解释：第一，英国认为印度人口稠密，没有配备“防空面具”或“其他适当设备”，宣言一旦发表，将会引起“印民恐慌，无以应付”，因此“盼暂缓议决”；第二，英国认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发表警告侵华日军勿施毒气战宣言，如果日军再“滥施毒气等不法战术”，英国“必与美一致，亦予以同样保护”，因此丘吉尔“请各代表先行研究，我方提案待日后续议”。丘吉尔的表态，令蒋介石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提案公开发表制止日军勿施生化战的计划落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仍然只有罗斯福的对日声明，这对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 六、结论：棋赛中的一个走卒

1942年4月19日蒋介石致宋子文电文称“在联合参谋会议和战争物资供应等重大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受到与英国和俄国一样的平等对待，而仅仅被作一个受监护者”；中国“作一切准备以支持美国的政策，有时甚至不惜违背我们自己的判断”，“毫无保留地为联合国家的事业贡献了我们的一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和俄国人的态度。只要事关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从不会对共同的利益作出什么让步”，“如果将来英美联合参谋会议不扩大以容纳中国，如果中国继续被拒于军火分配委员会之外，那么，中国则将仅仅是棋赛中的一个走卒而已”。处于“大国”外交迷幻中的蒋介石，对英美的任意一分有利于中国的表态，都抱有十分的幻想。罗斯福承诺为中国抗战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发表对日声明、

提倡中国“四大国地位”，蒋介石报之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卑微姿态。丘吉尔发表对德声明只字不提中国令蒋介石26个小时难以释怀，缅甸战事抛弃中国军队也让蒋介石大骂英国背信弃义。但丘吉尔一提英国对华经济援助、一提英美将重返缅甸战场、一提英国提供印度作为援助中国交通通道，蒋介石马上发表英国之态度“自本月起亦完全改善，自认其过去之非礼矣”。这种“大国”外交迷幻，纵然可能获得某些成功，如罗斯福应约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细菌战声明。但正如王世杰指出的，“此种表示，系应我政府自请求而发”，并非美国“主动”而发，其效力、影响力无法与丘吉尔主动发表对德声明比较。更何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只会如顾维钧在伦敦太平洋军事会议上敦促大会发表制止侵华日军细菌战声明一样，提案成功，讨论搁置，最后无疾而终。

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犹如棋赛中的一枚棋子，期待以“牺牲”“让步”换取盟国制裁侵华日军毒气战声明，成败由它不由己。反观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首先尝试向国际社会发出谴责侵华日军生化战通电，到1942年6月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关于控诉暴敌毒杀北坦同胞罪行通电、7月《新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控诉揭露日寇在华北施毒罪行的社论，再到1944年7月22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痛斥日军使用毒气声明，中共清楚地认识到仅靠向国际社会揭露日军生化战罪行和呼吁国际爱好和平人士声援、支援中国抗战是不够的。中国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途径，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抗战，与日军生死搏斗，“我们声明：在困难的环境中，不气馁；不妥协地既与日寇生死搏斗了五年，今后，我们将会像以前一样的与日寇搏斗下去，直战到最后胜利。”\*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省

· 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

（摘自《学术月刊》2021年第7期，原文约26000字）

# 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

朱乃诚

## 一、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的高档次文化遗存及其年代分析

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自然不能简单地以已经发掘的两座“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座“祭祀坑”的年代作为探索的主要依据，因为这些坑是三星堆文明后期的遗存，而是应以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一批能够反映三星堆文明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作为探索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的能够反映其文明已经形成的高档次文化遗存主要有：发现于月亮湾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附近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座坑类遗迹、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以及正在发掘的六座坑、月亮湾仓包包一座坑类遗迹、三星堆遗址西侧仁胜村墓地、三星堆城址城墙、青关山大型建筑遗存等。这些遗迹及其遗物是否为三星堆文明中年代较早或最早的一批遗存，需要仔细分析甄别，下面就对这些遗存进行逐一分析：

### （一）月亮湾燕家院子玉石器坑类遗迹

1929年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门前发现的玉石器坑类遗迹，出土玉石器数量达三四百件之多。遗迹中的玉器，至少分属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四期、齐家文化、二里岗文化时期、商代晚期五个阶段。而这座玉石器坑类遗迹的年代即这批玉石器的埋藏年代，只能依据这批器物的最晚年代来确定，应是在商代晚期时期埋入的。如果考虑四川博物院藏品A110483有领玉璧制作之后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而使其磨损，那么其埋藏年代可能在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

### （二）三星堆遗址附近高骈乡机制砖瓦厂一座坑类遗迹

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附近的广汉高骈乡机制砖瓦厂发现一座坑类遗迹。高骈这座坑类遗迹中出土的1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3件玉器，除1件年代不明外，其余的分别为商代晚期后段和可能是三星堆遗址三期的作品。据此推测高骈这座坑类遗迹的年代及其绿松石铜牌饰和玉器的埋藏年代在商代晚期后段。

### （三）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

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坑内堆满了大批珍贵文物，大部分是相当于商代晚期的作品。但也有少量的早期作品。如一号“祭祀坑”K1:11—2玉琮，外径（边长）6.8厘米、内径5.2厘米、高7.3厘米，制作粗略，是齐家文化作品。又如二号“祭祀坑”K2③:201—4玉璋，器表两面施刻祭祀场景的图，是由牙璋改制的作品，改制前的原件牙璋，可能是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的作品。

关于三星堆两座大型“祭祀坑”的年代，发掘主持者与发掘报告编写主持者陈德安将两座“祭祀坑”的埋葬年代，分别推定为殷墟一、二期之间与殷墟二期晚段至三、四期。但一号“祭祀坑”出土了陶尖底盏和陶器座，这两件陶器可能是配套使用，应是有意埋入的。这类陶尖底盏见于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三星堆一号“祭祀坑”的陶尖底盏的形制特征，最早的可能属三星堆遗址第四期早段。据此可确定一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不会早于三星堆遗址四期早段，可能相当于商代晚期后段或商末。二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